《心花路放》公路獵艷之旅

繼《瘋狂的石頭》、《無人區》後，寧浩再攜《心花路放》橫掃影院，創下內地一天一億的票房奇跡。對於本地觀眾而言，寧浩不是個熟悉的名字，其幽默的敘事風格也未必合口味，但從《瘋狂的石頭》開始的鐵三角組合——寧浩、黃渤、徐崢，每次都帶來驚喜，瘋狂、麻甩、不合常理的故事，不是最好，卻最有味道。 文：笑笑

中國一向少有公路片，但寧浩本人卻第二次拍公路電影，無疑公路對其來說有特殊的意義。寧浩便將公路比喻為拍電影的過程，每次拍電影他都有「在路上」的感覺，「從開始到完成都是一次獨特的人生體驗」，寧浩說。電影走過北京、大理、香格里拉、張家界、芙蓉鎮、昆明等地，徐崢與黃渤這對難兄難弟因失婚而開始旅程，最後因重回故地反倒被療癒了。

罕見公路片

這是一部極盡荒謬之能事的療癒電影，沒有大是大非，在路上的一切，雲淡風輕，如同黃渤與袁泉那段經不起時間考驗的愛情一樣。因失戀失婚踏上旅程不是新鮮事，早前上映的印度喜劇《小失戀．大漫遊》也走這個路線，而《心花路放》的背景也源自編劇的親身經歷。去年，編劇岳小軍情感受挫，寧浩便驅車帶他散心，兩人駛過大半個中國，遇上各式各樣的人和事，煩擾鬱悶都在這趟旅程結束後煙消雲散。

說起公路片，筆者一向覺得中國東西南北風情各異，路上風光處處，有拍公路片的條件。而黃渤與徐崢兩個麻甩佬也不負眾望，沿途風花雪月，先遇上阿凡達女郎來一段一夜情，後又有髮型屋少女破格演出，再加上都會靚女的噓寒問暖，黃渤打算豁出去表白之際，才來一個峰迴路轉，如墮深淵。

公路上奇聞異事特別多，荒謬、不合邏輯之事亦大把，正好對照當下中國，騎呢荒誕。阿凡達女郎表面冷酷，內心卻熱情如火；理髮小姐標奇立異，生活卻異常空虛；長腿美女舉手投足大方得體，原來是個女同性戀者。看似正常的事，卻深不可測，事情往往出人意表。公路上的際遇，隱隱反映了內地社會的畸形發展。

路上眾生相

電影走雙線敘述，黃渤與徐崢是現在式，而袁泉的視角則是過去式，兩者在最後交匯成一，頗有驚喜。看似毫不相關的兩條主線，電影從一開始已埋下伏線，袁泉飾演的康小雨因在好友婚禮遇上前男友，傷心之下在網上聽到黃渤飾演的耿浩所唱的《去大理》一曲，遂做個背包客，瀟灑闖大理。她在大理邂逅一隻狗及旁邊酒吧的一個怪老闆，因發生種種不如意之事，最後打算執包袱走人。此一設計與耿浩的公路闖蕩交叉發展，而恰恰耿浩也帶着一隻狗出遊。十分偶然的《去大理》歌曲與兩隻狗狗，就是用來鋪梗，直到耿浩與死黨鬧翻，隻身遠赴大理時，兩個時空合二為一，事件的來龍去脈一清二楚。

最後那場幹架的戲固然胡鬧，但亦可將之視為耿浩公路之旅結束、回到起點面對現實的發洩。一路走來，寧浩的腹黑嘲諷收放自如，小雨因偶遇前男友而撒下要結婚的漫天大謊，刺中中國女孩要臉好勝輸不起的心態。而兩個中年「土豪」，花錢不眨眼，遊戲人間、花天酒地的行徑，最後惹來阿凡達女郎的死纏爛打及「行得夜路多，必有遇鬼時」地遇上黑社會老大，一眾混混大幹一場，徐崢那一槍擊中了中國人「脆弱」的心靈，好友拉不下臉反面了。

寧浩說，「我關心身邊的故事，更關心中國人身邊的真實故事。《心花路放》直面每一個中國人現在面臨的問題——我們的情感世界受到了物質世界的壓迫，我們要如何面對這種失落感？我想通過喜劇的方式，給出一個人生的答案。」

幕後花絮

片中出現的《去大理》CD封面是黃渤過去當歌手時的照片。黃渤在片中飾演過氣歌手耿浩，現實中的他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亦是歌手，曾在酒吧、歌廳獻唱，並舉行過全國巡迴演唱會。

此外，除了阿凡達女郎外，片末徐崢亦「cosplay」阿凡達。原來寧浩很喜歡《阿凡達》電影，總想要在電影裡惡搞一下，當他發現天門山的旅遊景區竟然把阿凡達演出當成旅遊噱頭時，便順便將之搬到電影裡。

寧浩惡搞之心從不間斷，黃渤與徐崢反面時，突然爆出一句粵語對白：「從今日開始，我同你，恩斷義絕。」然後徐崢向天開五槍。據說這是向吳宇森執導的警匪片《喋血雙雄》致敬。

影訊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辛鵬

經典影片亮相烏魯木齊亞歐電影展

以「交流、合作、夢想」為主題的第二屆烏魯木齊亞歐電影展昨日在新疆藝術劇院正式拉開帷幕。八天的展映期內，將有中國、法國、韓國、加拿大、印度、俄羅斯、塞爾維亞、西班牙、冰島、荷蘭等12個國家的26部經典影片與觀眾見面。其中包括獲第66屆康城影展最佳女演員獎的法國電影《Le passé》（《伊朗式離婚》）、法國新浪潮女性導演Katell Quillevere的獲獎作品《Suzanne》（《蘇珊娜》）、獲第四屆北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的加拿大、印度合拍電影《尋子記》，以及在康城影展熱銷的韓國大片《流感》等。

以上影片除在烏魯木齊和昌吉地區12家影院展映外，還將走進新疆大學、新疆財經大學、新疆農業大學開展校園巡展。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王武龍指，第二屆烏魯木齊亞歐國際電影展「將充分發揮烏魯木齊亞洲中心獨特地理位置和輻射周邊中亞地區的文化匯通優勢，為新疆與國內外電影界搭建一個交流合作的平台，培育和推動新疆電影市場走向成熟。同時，滿足新疆各族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以現代文化進一步推動新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民心相通』。」

據介紹，新疆影視事業近年來日益繁榮，湧現出《庫爾班大叔上北京》、《美麗家園》、《大河》、《生死羅布泊》、《鮮花》等一批富有民族地域特色和人文情懷的優秀作品，並有電影《真愛》獲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電影《伊犁河》獲聖地亞哥國際兒童電影節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創音樂獎。

揭秘《汾陽小子賈樟柯》

文：新華社

早前，由巴西國寶級導演瓦爾特．薩列斯（Walter Salles）拍攝的、以中國著名導演賈樟柯為主角的紀錄片《汾陽小子賈樟柯》亮相2014聖保羅電影節。放映當晚，電影院門口一度排起長龍。

同一天，與紀錄片一同發佈的還有新書《賈樟柯的世界》。該書由陪同拍攝的法國資深影評家讓．米歇爾．弗羅東與導演薩列斯合著，講述他們對賈樟柯電影的理解與感受，並記錄賈樟柯每部重要電影的創作思路和歷程。

這部紀錄片從策劃到拍攝歷時六年。據賈樟柯回憶，他與薩列斯相識於1998年柏林電影節，當時他的《小武》和薩列斯的《中央車站》分別獲得青年論壇單元大獎和最佳影片金熊獎，之後他們開始互相關注對方的電影。現年58歲的薩列斯是著名導演，其代表作有《中央車站》、《摩托日記》、《在路上》等。

2007年，賈樟柯第一次來到聖保羅電影節，當時電影節組織了一次他和薩列斯的談話節目。準備了很多問題的賈樟柯驚訝地發現，薩列斯的問題更多，那次對談幾乎成了薩列斯單方面的採訪。「他對我電影的熟悉和理解讓我非常感動，」賈樟柯回憶。

電影節結束時，薩列斯告訴賈樟柯，要為他拍一部紀錄片，並寫一本書。賈樟柯當時並沒有當真：「我當時根本不相信這麼一個享譽全球的導演有時間真的去拍我、去寫書，當時覺得聽聽就算了。」

2008年康城影展，兩人再次相遇，薩列斯表示已開始做拍攝的準備工作，賈樟柯那時仍然以為他是說着玩的。又過了一段時間，薩列斯的新作《在路上》完成在美國的宣傳之後，他告訴賈樟柯即將要寫書和拍片了。「我那個時候才意識到他真是要拍啊！」賈樟柯很是意外。

薩列斯在談到自己的感悟時說：「感謝這六年的時間給予我的沉澱，因為這六年中，賈樟柯仍在用他的作品持續震撼着我。」

「如果說一部電影是從影院燈光熄滅時開始，那麼賈樟柯的電影對我來說，永遠不會結束。」薩列斯如是說。

在剛剛閉幕的羅馬電影節上，電影節主席馬克．穆勒稱這部影片是「第一次由兩位發展中大國導演進行的對話」。

這位44歲的中國導演在解讀本片時說：「如果你同時看過他和我的電影，你就會理解為甚麼他要拍這部紀錄片。我們的電影大部分都在路上，我們的社會有相似之處，我們的經濟發展以及我們的電影之間都有相似之處。但最重要的是兩個人的相遇，兩個人真的就碰上了，而且我們就是投緣，才會有這部紀錄片。」

薩列斯曾這樣闡述自己拍攝這部紀錄片的理由：「賈樟柯的作品有其獨一無二之處，對於他來說，電影就是記錄變革中的記憶的一種形式，他的電影刻畫了那些沒有權力的普通人在社會變遷中真實的存在。」

新書《賈樟柯的世界》作者之一弗羅東則在文章中寫道：「賈樟柯的作品是超越時間、空間和文化的，你可以在其中同時感受到平凡和不平凡。即使不懂中文，你依然會受到震撼，甚至可能這種語言的障礙反而幫助你更深刻地了解那種存在的厚重與渺小。」

同時，賈樟柯也對自己過去的作品有了新的理解：「我發現事實上我一直關心的主題都是人，只不過我在拍攝這個主題的時候，沒有把人跟社會、政治和經濟的關係切斷。所以不是因為我對變遷感興趣而去拍電影，而是因為我對人感興趣，而恰好拍到了變革。」

影評

文：張心曼

像賭徒一樣不肯離枱 評許鞍華《黃金時代》

她選擇了最「笨」的方式拍《黃金時代》——耗時五個月、轉戰六地上萬公里取景。「眞實的環境會帶來眞實的狀態，在（東北）零下三十度裡哆嗦着說話，這是任何表演不能帶來的自然狀態。」她是香港導演許鞍華。電影《黃金時代》的意義並不止於女作家蕭紅的討論，更延伸到許鞍華電影作品的風格，也提出了民國風骨和性別的命題。許鞍華說電影《黃金時代》的意義在於提醒當世人：「曾經有一段歲月，曾經有一群志向不同的人，各自以不太一樣的方式，在種種現實艱困裡探索、思考、付出、抉擇，這樣的時代，當然可稱黃金。」印象中的許鞍華不改一身黑衣，俏皮的短髮，幽默謙和的笑，繼續不慍不火地拍電影，一年一部，也許像鄺保威編著的《許鞍華說許鞍華》裡許鞍華形容自己拍戲的心態——賭徒，「一直不肯離枱那種。輸輸輸，差不多輸完之後，我贏了一把。但我贏完又輸，不行，我要贏回本錢才走。翻本了之後又覺得不夠，要再多贏點。」

1936年11月19日蕭紅在日本給蕭軍的長信談到自己的「黃金時代」：「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適，平靜和安閒，經濟一點也不壓迫，這眞是黃金時代，但又多麼寂寞的黃金時代呀！別人的黃金時代是舒展着翅膀過的，而我的黃金時代，是在籠子過的。」這是電影「黃金時代」片名的由來，在許鞍華看來卻具有反諷之意。

許鞍華經歷電影事業的低潮後，殺回香港，再聚焦平凡的市民生活，拍出了職業生涯的另一巔峰之作——《天水圍的日與夜》。許鞍華的電影作品愈來愈爐火純青，《桃姐》的獎項和票房雙豐收，一直到《黃金時代》，「六十知天命」的許鞍華又開始其賭徒心態，用高達8000萬的投資拍文藝片，玩實驗、玩先鋒，想怎麼拍，就怎麼拍。正如電影《黃金時代》的母題：「一切都是自由的」。

不少電影評論者說許鞍華的作品及《黃金時代》有「女權主義」色彩，其實女性題材只是許鞍華近幾年電影創作的一個主題。許鞍華在訪問中提及：「我不知道我是『女性主義』，我覺得好就去拍，結果呢，拍出來了人家都說我是『女性主義』，我這算不算被迫做『女權主義』？」事實上，在許鞍華的電影事業裡，她不斷嘗試各種題材，言情片、武俠片、文藝片甚至恐怖片，她鏡頭中的女性倒是眞文藝的，如《傾城之戀》裡的繆騫人，一張小臉「淨得像瓷，透得像玉」。

更準確概括許鞍華的電影風格，是香港電影研究者羅卡總結的：「貫穿許鞍華所有作品中一個重要的母題是人的流徙不安，更精確點，是人被環境所迫而飽受流離無根之苦。」而這一母題，正好也暗合了蕭紅一生的顛沛流離。

《黃金時代》一開首，湯唯演的「蕭紅」說了一句：「北方是悲傷的」。攝像機俯視群山，穿梭於冰川，配以音樂的旋律，是許鞍華鏡頭裡對生命和世界的詩意歌詠。《黃金時代》結尾，蕭紅最後一次出現，唸了一段《呼蘭河傳》裡的文字：「我生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多歲了，祖父一過了八十，祖父就死了。從前那後花園的主人，而今不見了，那園裡的蝴蝶，螞蚱，蜻蜓，也許還是年年仍舊，也許現在完全荒涼了。」唸完，蕭紅離開書桌，空鏡頭，電影結束。這種方式使電影充滿了對世界、生命和歷史的拷問。許鞍華電影作品的好在於從不低估觀眾的思考能力，讓觀眾有更多空間去觀察和打量歷史和生命。